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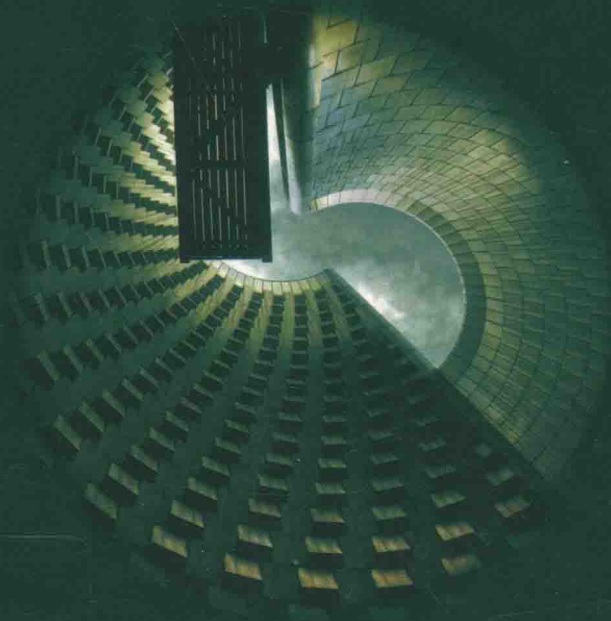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Sociological Approach:
With the Guidance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

——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

陈 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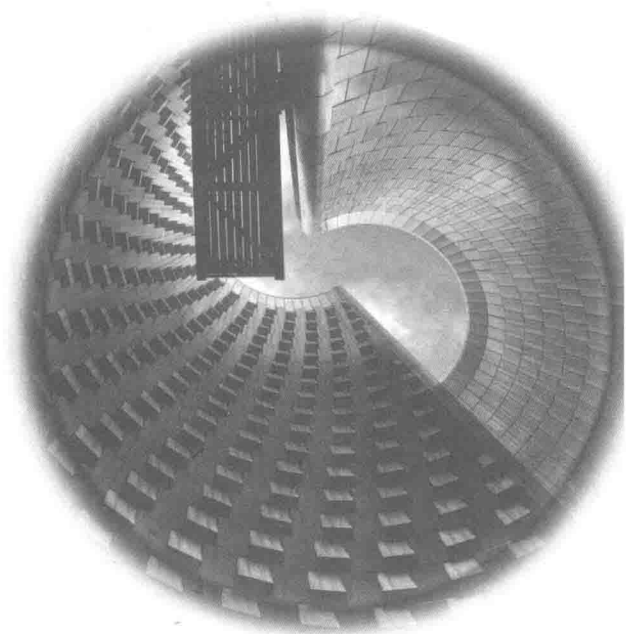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Sociological Approach:
With the Guidance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

——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

陈 秀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 / 陈秀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7-308-16452-8

I. ①翻… II. ①陈… III. ①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0850 号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
陈 秀 著

责任编辑 诸葛勤

封面设计 周 灵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孙 鹂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15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452-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奠基人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Holmes) 于 1972 年在其里程碑式的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中最初提出了“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一说法, 并做了简述。后来, 在翻译学“文化转向”进程中, 在描写翻译学的深入发展中, 以“翻译社会学”或“社会翻译学”为名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从此开始走向发展。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陈秀副教授是国内较早关注社会翻译学的学者之一, 她历时多年主持完成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就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该书稿从我国翻译研究现状梳理为切入, 立足社会学研究视角, 以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社会学理论内核为主线, 紧密结合典型译例和译家译事, 主要从布迪厄语言观与翻译、文化资本与翻译、惯习与译者等方面对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进行深度透析和积极探索, 立论鲜明, 观点新颖, 论据充分, 理论联系实际, 史料翔实, 旁征博引, 分析较深入, 阐述较到位, 对当下翻译研究不乏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学术价值。

但依我个人陋见, 该书稿的理论视角如果能将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与拉图尔 (Bruno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 有机融合, 则有可能为译作的生产与传播研究构建更为系统的翻译研究社会学途径。该书稿的研究对象倘若能在“惯习与译者”一章另添一节关于国内某位译家的惯习与翻译研究, 则更趋完美。

是为推荐。

陈秀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6年10月

前 言

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

本书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翻译的实践性决定了其与生俱来的社会性特征，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原作、译作、原文作者、翻译行为者、译文读者等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实践原则、关系主义方法论原则及其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为阐释翻译的社会性、翻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翻译行为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

本书借用了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语言观、资本、惯习、场域等主要概念，对中国语境下的翻译行为以及中西方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的翻译行为进行梳理，以典型翻译事例或事件客观描述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翻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翻译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在社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根据布迪厄的说法：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行为者之间的语言交流始终存在着权力支配关系。在场域空间中，社会行为者在惯习的作用下，通过累积和企图垄断各种不同的资本，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进而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布氏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对翻译进行如下描述：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行为者们遵守一定的规则进行翻译活动，他们长期以来养成的文化惯习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译本的产出风格等有决定性的影响。通过翻译，某种语言或者文化可以累积一定的文化资本（翻译文本及其影响），从而在全球化的社会文化场域中争夺到一定的位置。随着翻译行为以及相应累积资本的发展变化，文化场域中各种力量对比也不断发生变化。

本书由五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导论”，主要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四个阶段、三个转向以及译者身份、学科建设等问题。同时对翻译领域社会学研究视角的现状进行了述评，并阐述了该角度研究切入的意义。

第二章“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介绍”，对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以及布迪厄的语言观、场域、资本、惯习等主要概念进行了介绍，为后面的研究奠定



了基础。

第三章“布迪厄语言观与翻译”，探讨了语言中所蕴含的权力问题。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一种操作力量，是语言争夺中心位置强有力的武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各种矛盾实质上体现了各种权力关系之争。

第四章“文化资本与翻译”，分析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特征，认为语言和翻译属于文化资本的一部分，二者的表现形式（文本/译本的产出和影响），即文化资本累计的多寡，是行为者（译者、译文读者、出版机构等）获取文化场域位置和利益的一种标志。换句话说，在翻译过程中，行为者获得的文化资本越多，他们在某种文化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就越优越。本章还对译作这种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进行了分析。

第五章“惯习与译者”，主要探讨了译者的惯习和翻译之间的关系。译者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形成自己特有的双重文化惯习，而这种惯习又对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两次曼大求学，数年思考积累，期间由于各种原因的搁置，这本书终于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在此期间，得到了来自老师、朋友、亲人的无私帮助、关心和支持。没有他们，难以想象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感谢 Mona Baker 教授。2007 年我第一次到曼彻斯特大学研修，正是在她的课堂上，我首次认知了文化资本、场域、惯习等概念，认识了布迪厄，启发了我从社会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的思路。当后来 Mona Baker 教授得知我对此课题感兴趣并想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她慷慨地给予了我第二次赴英访学的机会，促成了我 2014 年再次到曼彻斯特大学访学，得以收集到与课题相关的资料。

感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致礼教授一如既往的鼓励和支持。孙教授是我学术生涯的引路人，正是他对翻译的热爱和痴迷，让我爱上了翻译，开始了翻译实践。我从最初在《英语世界》上发表短小的译文，到后来翻译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教授的茶文化作品《瑞草之国》与《爱茶者说》等，都离不开孙教授的关怀。正是他在翻译研究中的求真精神，鼓励我在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前行——《浙江省译家研究》这本处女作的选题就得益于孙教授的指点。

感谢浙江财经大学的黎昌抱教授。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对本书的写作思路进行了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感谢他还为本书写了序。

感谢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历任领导和英语系全体教师以及外语学院同事的支持和关心。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诸葛勤老师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和我商讨图书出版的细节，并对书中文辞表达的不当之处进行修订。

感谢我的朋友和家人对我一贯的理解、宽容和照顾。朋友的交流和支持，总能让我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有继续前行的勇气。家人无私的包容和理解，是我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母亲在世时，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大儿子高考的那一天，还叮嘱我不用早起，他可以自己搞定一切；小儿子总是尽力做到生活中的自立；丈夫在生活中，总是做到对我一如既往无条件的关爱和细心的照顾。没有他们，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尽管本着踏实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撰写，但由于识浅力薄，直到书稿交稿之时，内心仍然惴惴不安，因为深知书中仍然存在诸多不成熟的观点和纰漏。不足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学者见谅并赐正。

陈 秀

2016年11月3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1.1 我国翻译研究回顾	1
1.1.1 翻译研究的四个阶段	1
1.1.2 翻译研究的三个转向	6
1.1.3 翻译研究的几个问题	12
1.2 社会学研究视角切入	29
1.2.1 翻译活动的语言性特征	29
1.2.2 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特征	31
1.2.3 社会学研究视角现状	34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43
第二章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介绍	49
2.1 布迪厄简介	49
2.2 布迪厄的语言观	51
2.2.1 语言是一种实践	52
2.2.2 语言是一种权力	53
2.2.3 语言是一种策略	54
2.3 布迪厄的三个核心概念	56
2.3.1 场域	56
2.3.2 资本	59
2.3.3 惯习	61
2.4 语言观、核心概念与翻译	64
第三章 布迪厄语言观与翻译	69
3.1 语言是什么?	69
3.1.1 语言是一种神性	70
3.1.2 语言是一种存在	73
3.1.3 语言是一种工具	76
3.2 语言观与翻译	78
3.2.1 神似与化境的语言观	78



3.2.2	可译与不可译的语言观·····	82
3.2.3	对等与等值的语言观·····	86
3.3	布迪厄语言观与翻译·····	88
3.3.1	强势语言对翻译的操控·····	88
3.3.2	翻译是社会的重构力量·····	93
3.3.3	翻译行为者的权力操控·····	97
第四章	文化资本与翻译·····	101
4.1	翻译是一种文化资本·····	101
4.1.1	文化资本的特征·····	101
4.1.2	翻译的身体化特征·····	105
4.1.3	翻译的客观化特征·····	107
4.1.4	翻译的制度化特征·····	108
4.2	翻译行为者与文化资本·····	115
4.2.1	国家权力机关与文化资本·····	115
4.2.2	译者与文化资本·····	119
4.2.3	翻译赞助人与文化资本·····	125
4.3	译作与文化资本·····	129
4.3.1	原作的文化资本·····	129
4.3.2	忠实与文化资本·····	135
4.3.3	译作的社会功能·····	139
第五章	惯习与译者·····	141
5.1	译者的惯习与翻译·····	141
5.1.1	译者的双重文化惯习·····	141
5.1.2	文化惯习与翻译思想·····	144
5.1.3	文化惯习与翻译行为·····	147
5.2	葛浩文的惯习与翻译·····	156
5.2.1	葛浩文的双语惯习形成·····	156
5.2.2	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与惯习·····	159
5.2.3	葛浩文的翻译实践与惯习·····	162
	参考文献·····	166
	索引·····	177

第一章 导论

1.1 我国翻译研究回顾

在进行本课题论述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大致状况进行简要的梳理,这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只有清楚了我国翻译研究的状况,才能找到合理的切入点进行研究。谈到翻译这个活动,应该没有人会去质疑它历史的久远,因为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类开始用语言作为工具进行交流的那一天。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翻译常常处于一种透明而尴尬的境地:虽然翻译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交流活动一直存在,却很少受到世人的关注,就像人们生活中呼吸的空气一样,时刻被需要,却不被人感知和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前,虽然有众多的翻译实践者孜孜不倦地埋头苦干,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却很少有学者对翻译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各地的学者才开始借助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翻译进行探索。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也逐渐改变了被遗忘、被忽视的局面,其学科重要性日益凸显,翻译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翻译研究从随感式、点评式的语言文本研究中走出来,呈现出一种多元和开放的态势。翻译研究发展到现在,我们说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三个转向,其间伴随着对翻译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激烈讨论,体现了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过程。这些讨论包括:翻译的“忠实”问题、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翻译中的译者身份问题、翻译学科建设等等。

1.1.1 翻译研究的四个阶段

学者吕俊对翻译研究的阶段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我国的翻译研究走过了传统的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研究等范式,目前我们所从事

的是建构主义的翻译学研究(吕俊, 2006)。我们可以用表 1.1 来说明这几个阶段的大致情况。

表 1.1 翻译研究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特征

翻译研究阶段	语文学阶段	结构主义阶段	解构主义阶段	建构主义阶段
时间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半期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至 21 世纪初	21 世纪初至今
主要特征	主观、零散、不系统、重灵感、靠直觉	客观、重文本对比、科学性、机械性、工具性、忽略外部因素	关注外部因素、多元、消解、解构、离散、重解释	建构、本体回归、多视角、多层次
代表性言论	神似说、化境说、灵性说、信达雅	等值说、对等说	文化学派、阐释学派、目的论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女性主义翻译、后殖民主义翻译	翻译学本体研究、翻译研究的不同途径
代表人物	钱锺书、傅雷、严复	奈达、卡特福德、雅各布森、纽马克	巴斯奈特、勒菲弗尔、根茨勒、图里、文努蒂、斯坦纳、斯内尔-霍恩比	吕俊、许钧、谭载喜、刘宓庆等众多学者
理论基础	缺乏理论基础	结构主义语言学	解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社会学理论等

1. 语文学阶段 (the philological stage)

我国的翻译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都可以归为这一阶段。这一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翻译研究时期。这一阶段翻译研究的特征是有很强的主观性, 普遍的观点是把翻译活动看成和文学创作一样, 是一种灵感和悟性

的呈现，人们认为翻译家是天生的，而非培养的，翻译活动“全取决于译者个人，取决于个人素质与能力，包括天才与灵感”，“翻译是有赖于个人能力的艺术”（张经浩，1999）。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凭着自己的好恶来选择翻译作品以及翻译方法，对翻译的评论多为点评式、随感式，没有什么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基础，所以这个阶段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这一阶段的本质是“前科学的”（pre-scientific），具有“早期自由式翻译的热情”（early enthusiasm for freedom in translation）（Nida, 1993）。主要翻译目标是“美感经验对等”，对翻译的态度偏重于“主观”，总体来说是译者“重效果”、“跟着感觉走”者居多（胡庚申，2004）。傅雷的“神似说”、钱锺书的“化境说”以及严复的“信达雅”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言论。

2. 结构主义阶段（the structural stage）

这一阶段主要指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外的翻译理论开始陆续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翻译研究无理论的状况。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主要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强调语言的共性和规律性，使用语言分析、文本对比的方法来探讨翻译活动，突出语言的工具性。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开始对翻译进行“科学”的研究：基于“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的思想，奈达（Eugene Nida）提出了“翻译是科学”的主张，后来又提出“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等翻译原则（谭载喜，1999）；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于 1959 年发表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存在的一般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英国学者纽马克（Peter Newmark）提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 C. Catford）在其 1965 年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中，用现代语言学视角诠释翻译问题，将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并指出“对等”是关键词，将寻求对等视作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中心问题（谢天振，2008）。在众多国外翻译理论的译介中，美国翻译家奈达的著作最多、最系统，影响力也最大，因此也可以说那是一个中国翻译界言必称“奈达”的时代。而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就是“等值”“对等”。相对于语文学阶段来说，这一阶段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帮助我们破除了长期以来语文学翻译研究模式留给我们的神秘感，带来了科学

和分析的思想,克服了主观主义,以语言分析代替了直觉感受,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活动了,让我们从主观主义走向了一种客观性(吕俊,2001a)。但是要指出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仍然将分析和研究集中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上,并没有走出原文文本中心。这种研究模式过分强调语言的对等和规律,忽略了翻译活动中影响翻译产品形成的外部因素,使翻译程序化、科学化、机械化、简单化,把翻译活动看成了纯粹的语言活动,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理想化了的东西,形成了语言逻辑斯中心主义,忽视和压抑了人的主观创造性与能动性,同时也抹杀了翻译活动的人文性和社会性。

3. 解构主义阶段 (the de-constructural stage)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在中国走过了其轰轰烈烈的黄金时代,终归由于其研究模式的缺陷,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被来势汹汹的解构主义思潮所取代。在这一阶段,翻译研究者们借助文化学、思维学、社会符号学、阐释学、现象学等多学科知识,从多元、多层次、多角度来探讨翻译问题。翻译研究再次取得了突破性发展,走出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文本中心的藩篱,从结构主义研究阶段走向了解构主义研究阶段。一时间,翻译的目的论学派、操控论学派、文化学派等多种学派从西方逐渐引进,取代了奈达翻译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些翻译学派是西方六七十年代解构主义运动的产物。解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intentionality)把“人”这一主体概念引入了意义形成,从而打破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那个封闭的符号系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理论认为真正的理解是新的意义的生成。这就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规律设定意义的原则形成一种否定力量,这种理论不仅强调了主体间的对话性,还把“时间”(历史)的概念也引入意义的形成之中。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关于意义延异(differance)和播撒(dissemination)理论则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否认了结构的存在。他的主张就是“解构”,就是要突破原来的系统,打开封闭的结构,排除中心和本原,消解二元对立。在他看来,语言的实质只是一种差异与延宕的永无止境的游戏。文本只是这场游戏中的一个系统,没有任何本原和中心。因此世间没有完全独立的文本,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特征(吕俊,2001c)。在这个阶段,翻译研究者们批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工具理性、语言中心论以及二元对立的观点,纷纷将目光投向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表现出多元、消解、离散、解构、重解释的特点。这一阶段的哲学

基础是解释哲学，根据解释哲学的理念，翻译活动是译者的期待视域与作品的召唤结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的对话，翻译的整个过程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中介与隐含的作者的对话，译者的活动就是一种对话的参与（吕俊，2000）。这种解释哲学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拓展了传统译学的疆界，但是也带来了许多困惑与混乱。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使翻译活动本身受到拆解，完全排除了对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语言问题的研究，而将翻译研究变成文化、意识形态等研究的附庸。其结果必然会带来对语言的忽略而走向分散。而且相互抵牾的多元，即把翻译的本体拆解，只关注在这一活动中的其他次要因素（吕俊，2003）。

4. 建构主义阶段（the constructural stage）

翻译研究走过了主观、神秘的语文学阶段，科学、封闭的结构主义阶段，也经历了否定、消解的解构主义研究阶段，在短暂的“沉寂期”之后，翻译研究于21世纪初进入了更为理性和成熟的研究阶段，即建构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者们基本达成这样的共识：翻译学是一门与多种学科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又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国内有一大批为翻译事业无怨无悔付出的学者孜孜不倦地构建译学这座大厦。他们在注重翻译研究本体回归的同时，从不同视角、借鉴不同学科知识对翻译进行研究，使译学这座大厦日趋完善和成熟。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建构、本体回归、多视角、多层次。说它是建构的，是因为几乎所有翻译研究的学者都致力于翻译学学科建设这个事业。说它是本体回归的，是因为经历过解构主义阶段对语言消解、解构、去中心化之后，人们意识到从本质上来说，翻译终归是关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活动。因此，有学者警示：如果在翻译研究中一味借鉴其他学科知识，会导致“翻译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的位置的危险”（许钧，2003a）。也有学者呼吁翻译学应该保持自身的学科特点，恢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曹明伦，2006）。因此部分学者又重提“忠实”问题，认为“忠实”仍然是翻译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陈秀，2010）。说它是多层次、多视角的，是因为在众多学者的著作中，既有从本体上对翻译进行研究的，也有从不同视角和途径对翻译进行研究的。许钧、谭载喜、刘宓庆等学者对翻译的本质、过程、研究对象、标准、基本模式和学科框架等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而张美芳、俞佳乐、吕俊等学者则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对翻译进行多种途径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吕俊。他十几年如一日，执着地在翻译学的领域里耕耘，他

从 2000 年就开始陆续发表文章和著作,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阶段进行梳理,提出我国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解构主义阶段,并对这三个阶段的优缺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我们目前从事的研究是建构主义的翻译学研究(吕俊、侯向群,2006)。在其著作《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中,他从哲学基础、理性观、真理观、语言观、认识观五个方面论证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合理性。他的研究兼顾了翻译的人文性、社会性,同时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给读者以深深的启迪。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对我国翻译研究阶段进行划分的时候,虽然借用了学者吕俊的“建构主义”概念,但是笔者所提及的“建构主义”概念更为广泛,而学者吕俊的“建构主义翻译学”只是众多学者构建的译学大厦的一个部分或一个视角,即翻译研究的建构主义视角,就像“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一样。

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中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最终形成提供了思想源泉。马克思批判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片面理解错误,最后得出科学的实践观:实践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和探索外部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的物质活动。实践的主体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实践的手段是人所创造的工具;实践的对象是被人认识和改造的客观事物(赵甲明,2011)。我们有理由相信,译学建设这座大厦,在无数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必将会走向完善和成熟,如同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一样。

1.1.2 翻译研究的三个转向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三次转向,即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语言学转向,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文化转向,以及由于文化转向而诱发的权力转向。翻译研究中的每一次转向都是一个研究视角的改变,是对当时研究困境思索的结果。这种转向是渐进的、必然的,是学科融合交叉的结果,每一次的研究转向都使翻译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方法日益多样,最终促成翻译学科的独立和渐趋完善。

1.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的翻译研究处于语文学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忽视翻译的理论建设,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只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受任何理论的约束。也有人把翻译比作类似于油漆匠似的技术性工作:既然油漆匠学会了使用颜色,就可以照样本画山水人物,那翻译工作

者只要看懂外国文，会写本国文，又了解一本书的内容，就可以翻译。油漆匠从来不讲究什么理论，翻译工作者要理论做什么呢（董秋斯，1956）？今天看来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把翻译过分简单化，但是却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反对翻译理论的观点。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凭着自己的直觉经验选取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凭着自己语言的天分自由地从事翻译工作。翻译研究者们对翻译作品的评价也仅仅限于“效果”“感觉”和“意境”，翻译处于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外翻译理论开始陆续进入中国，改变了翻译界无理论、进行主观价值判断的状况。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结构语言学，人们几乎是以欣喜若狂的态度对待语言学在翻译领域的任意侵占的。翻译研究学者借助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句法学、篇章语言学等语言分支学科对翻译问题进行探索，试图用语言学理论来构筑翻译学学科理论。在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一下子对神秘莫测的语言似乎有了把握的可能，人们相信能在不同的语言之间找到共同的规律，翻译的可能性是基于不同语言相异的表层结构之下的语言共核，即语言的深层结构。国外学者提出的“对等”或“等值”，以及“翻译是一种科学”等主张均是这一转向的结果和体现。

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一方面是翻译研究领域自我寻求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语言学学科在20世纪世界学术领域霸主地位所决定的。

随着语言学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它在20世纪陆续征服了学术界的很多领域，致使不少学术领域，如哲学、社会学、文学等都相继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在哲学领域中，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将语言变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促成了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Kellner, 1995），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认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即存在依附于语言，人是符号动物，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后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德里达那里被拓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运用“解构”的思维方式，颠覆了语言中心论，指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一种游戏关系，语言的意义是在不断地延异中产生（覃安基，2011）。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特征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即用现代逻辑来对语言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分析，解决了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问题，从而解救了西方哲学的危机，被称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徐友渔，1994）。在社会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使社会学更深刻地切入了生活，解决了社会学中语言学的失落问题。语言学问题成为西方



当代社会学主流的主题,被广泛运用于利科(Paul Ricoeur)的解释学社会学、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社会学、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社会学、福柯(Foucault)与利奥塔德(Lyotard)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中。社会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把社会学引入了一个交往世界或者对话沟通世界(刘少杰,1999)。在文学领域,语言学的转向让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文学经验(意象、风格、主题、时代背景等)层面上拉回到语言本身的反思,这一转向革命性的理念在于必须把语言看作是文学及其知识甚至是再建构的前提条件,因为“吾语言之疆界乃吾世界之疆界”。文学的语言学转向颠覆了把意义看作是文字背后的实体的传统观念,包含了解读文本的更为复杂的多种差异性,继而产生了“文本”和“作品”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文本对阅读的依赖性和开放性,“作者死了”,一个上帝式的作者被无数多元化的读者所取代(周宪,2010)。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主张运用逻辑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实则是20世纪盛行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必然产物。语言学转向强调理性和科学,强调语言的规律性和可认知性,破除了传统翻译阶段神秘的面纱,提出了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研究方式,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是由于结构语言学忽略了翻译活动中的人文性和社会性,把非逻辑的因素绝对地排除在外,从而将翻译活动简单化、机械化。我们知道,在翻译活动中,非理性因素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在认识客观世界、获得真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客观性因素,即社会、历史及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更要受到主体生物特征、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虽然我们承认语言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把语言分析看作翻译学中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将全部的翻译问题仅仅归结为语言问题。

2.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我们知道,翻译行为绝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更不是一种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活动。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把眼光仅仅局限于翻译中的内部因素,关注语言层面的文本对比,忽略了社会大语境中对翻译产品产生的外部因素的思考,因此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式微,翻译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外部因素的研究,发生了翻译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即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